



2016年12月18日,由芳草杂志社主办的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揭晓,台湾作家蓝博洲的长篇散文《寻找祖国三千里》和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并摘大奖。

《寻找祖国三千里》的与众不同,首先表现在它既不是写宝岛风光,也不是讲述“走过咖啡屋”故事,而是展示人间热血沸腾的沸点,探查海峡另一边至深至痛的隐疾,书写台湾近现代史中曾讳莫如深、刻意遗忘的那一部分。

文章全名:《寻找祖国三千里——殖民地台湾青年吴思汉的身份认同之旅》;再看看正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起,一连七天,《台湾新生报》日文版刊载了一篇题为《思慕祖国不远千里——台湾青年的归国记》的文章,作者署名吴思汉。”“通过这篇报导,吴思汉报告自己为了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不惜放弃京都帝大医学部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再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地,最后终于抵达重庆的艰难而曲折的过程。”“然而,五年不到,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二二八事件’后改组易名的《新生报》却刊载了一则题为《不法叛逆危害‘党国’十四‘匪谍’枪决》的报导。这一次,吴思汉成为‘匪党支部书记’,而于前一天的清晨六时,与同案郭琇琮、许强等医界精英,在马场町刑场‘明正典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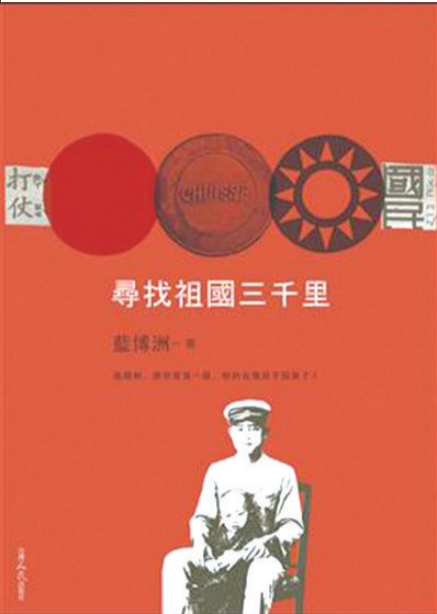
作者仿佛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在文学的天空下虬劲生长,蓝博洲的笔调是冷静、内敛的,沿着他“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从此专心从事我的台湾民众史的调查采访与写作的工作”之小径,我紧随他不紧不慢的足音,发现另一个台湾:

我不是风雅之人,更没有那份闲情逸致,可也来到这个莲花之乡。仅仅因为几个日据下台南二中华业的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提供的讯息——吴思汉的父亲当年好像在白河中山路开一家汉药店,我几次来到台南县白河镇。然而,因为没有认识的人介绍,我惊悚扰了唯一还住在那里的吴思汉的最小的弟弟,反而无法进行采访工作,于是几次在白河街上犹然挂着褪色的‘匀和汉药房’招牌的对街徘徊,不敢贸然登门拜访。我只能走到不远处的白河国民学校。那里原是日据时期吴思汉曾经就读六年的白河公学校。我坐在国小(即国民小学)操场的

蓝博洲《寻找祖国三千里》:

从历史深处打捞出的个人史

□郭海燕



《寻找祖国三千里》繁体中文版

笔录等,与主人公骨肉相融,扣入吴思汉流星般的人生:日据时期的愤懑成长,直至考级考上日本京都帝大,然后怀着“大学毕业,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是惟一目的”的志愿,负笈东瀛;终于,他为了参加祖国抗战,弃学绕道东京,穿越朝鲜半岛,奔至鸭绿江边,呼唤:“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

台湾作家钟理和有句名言:“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复活于蓝博洲笔下的吴思汉,就是这样的原乡人。1944年,“这个说着生硬普通话的台湾青年,一会儿被日本人追查,一会儿被同胞怀疑”,经过一年零两个月出生入死的辗转跋涉,他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抗战陪都重庆。然而,“就像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的《中国暴风雨》所云:‘在战争将近结束时,重庆变成了一个毫无忌惮的悲观厌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贪污腐化。’在重庆,吴思汉参加抗日工作的要求与热情,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再次受到怀疑与陷害。”

作者的笔端秋霜飒飒。此处蓝博洲接续时任《大公报》记者的李纯青晚年追忆吴思汉的文字:“据说国民党特务机关怀疑他是日本派来的间谍,想找一个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当时太平洋海战方酣,美军反攻已到菲律宾,雷伊泰一战胜利,听说下一步准备在台湾登陆。国民党军方已与美军驻华机构接头停当,要用美军飞机把这位台湾青年投落台湾,叫他与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以配合美军登陆作战。”“实际上,国民党也知道,阿里山是没有抗日游击队的。其结果,将是用日本人刀,杀台湾的抗日分子。”

作家那颗“要努力让这些被湮灭的台湾历史与人物,一个

个地出土”之文心,是怎样枏风沐雨、凌寒而绽?行文至此,那苍劲的笔尖是否轻轻颤抖?

为了不让爱国青年受骗枉死,李纯青在重庆约见吴思汉,告诉他真实情况,问他:“你愿意跳伞回台湾吗?”“在我(李纯青)问这个问题时,他(吴思汉)感到非常奇怪,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以为抗日而去。为抗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他的信念。他的简单答复断然拒绝了我的意见。他就要去接受训练了,正高兴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宾枪,一套日本军官制服。”

历史的玄机,非凡夫参透。个人的命运,永远裹挟于大时代。1945年4月1日,美军登陆日本冲绳岛,准备跳伞回台,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吴思汉,得以幸免牺牲。

然而,这位民族英雄的殉难,竟不可避免。五年后,因参加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吴思汉被扣上“匪谍”罪名,死于国民党当局枪下。

不惜花费十几年时间,寻访所有能找到的、熟悉吴思汉的当事人及证言证据的蓝博洲,借吴思汉遗孀李守枝女士之口,道出英魂在人间的最后模样:“我(李守枝)和小弟又转到殡仪馆认领(遗体)。他双手反绑着。小弟帮他解开。我看到他的心脏边和肚脐附近,一共中了三枪。我们随即办理火化申请。第二天,我再去领骨灰,然后跟我公公一起送回白河(镇)。”

在日据时期改名“思汉”的吴调和,从此长眠家乡小镇。亲人口中的“调和仔”,魂兮归去。

然而,“因为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结构而被扭曲了的台湾历史”,却始终没有“为这样的殖民地青年典型的吴思汉恰如其分地定位”。蓝博洲在篇尾深深慨叹:“这位台湾青年从台湾跑到重庆来,要求参加抗日。在大陆人地生疏,没有一个亲友,他抛弃家庭,跋涉万里,像虔诚的宗教徒般,投奔重庆朝圣。谁能理解这种意志,这种心情呢!”

谁能理解?也许只有台湾人理解。

2016年12月20日晚,我和同事陪同来武汉领奖的蓝博洲去华中师范大学作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寻访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

1960年出生的蓝博洲,面对台下的大陆年轻人,讲述了一名台湾文学青年的成长史:懵懂孩童时,接受社会、学校无处不在的反共教育;到青春年少,开始思考“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时,人忽然变得敏感起来了……“侯孝贤电影《风柜来的人》,其中的主人公生活,就是我高中休学后的写照!”蓝博洲坦诚相告。他说,从中学开始到上大学、服兵役,他一直大量读书,尤其文学书刊,努力用自己的眼睛、心灵去辨识、发见世界,去了解祖父、了解自己,了解真实的台湾和历史,从而在茫茫宇宙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我从阅读吴浊流的小说《无花果》,开始了解‘二二八事件’;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获得力量!”演讲中,他还屡屡提到刚刚逝世的著名作家、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陈映真,他盛赞:当其他方式不能说话时,陈映真先生以神秘的小说方式来讲述。他告诉听众:“1987年春节过后,我决定选择一种介于文学

创作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工作作为自己思想锻炼的场域,于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加入了小说家陈映真领导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的工作队伍。”

到《人间》杂志,蓝博洲的首项任务就是:对发生在40年前的“二二八事件”进行田野调查、写作,以制作纪念专辑。于是,一部在台湾知识文化界引起轰动的作品《美好的世纪》诞生,它发表于1987年“解严”前夕的台湾,当时可谓石破天惊。1985年即以小说获时报文学奖的蓝博洲自述,“《美好的世纪》是我暂停小说写作之后,第一篇文学性的作品”,“我也得到了陈映真先生的口头嘉奖,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从此,蓝博洲一头扎进长期被湮灭的从“二二八事件”到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台湾民众史现场。

《美好的世纪》也是一部关于早期台共的纪实作品,主人公是出身台北望族的医生郭琇琮,与吴思汉一样,生于日据时期的郭琇琮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曾因成立反日学生组织而被捕判刑。“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暴虐令无数台湾知识分子失望,郭琇琮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郭琇琮被扣上“匪谍”罪名,与吴思汉等一起被枪决。

我对郭琇琮的名字印象颇深。《寻找祖国三千里》中多次提到这个名字,其中一句曰:“一九四七年七月,吴思汉由台大医学院助教郭琇琮亲自吸收入党”。

蓝博洲说,经过台湾年龄最长的政治犯林书扬的介绍,他才得以采访隐名40年的郭琇琮遗孀林雪娇。饱经风霜的林女士向时年27岁的蓝博洲透露,丈夫临刑前一天,给一起服刑的她写了张纸条,内容是:“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说到这里,蓝博洲激动了,“当我听到这句话,我整个魂魄都被郭琇琮吸走了!”他的一只手情不自禁高高扬起,又落下。“我要写他!”郭琇琮牺牲前,设法告诉他的妻子,若能活下来,要她一定把他们故事写出来,将死之人竟连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纪》。

历史深处犹有回声的火热熔岩,就这么自海峡那边,不动声色而又分明轰隆隆地逶迤而来。蓝博洲说:“郭琇琮的生命之所以感人,并不是他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而是他对待生命的态度,我看到我们前面还有这样的台湾人,有这样无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都希望结束分裂,实现祖国统一!”所以“我就确定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之后的人生不做别的了,专心把郭琇琮这样的台湾人一个个找出来,一个个地发掘、出土。”

演讲临近结束,蓝博洲忧心忡忡地透露,台湾现在的年轻人令人担忧,因为他们从小在反共社会氛围中长大,很难去理解无数热血先辈所走的道路;尤其是白色恐怖时期爱国者们的后代,要让他们在目前台岛的政治生态下去了解、进而认同父兄们所选择的历史道路,可谓难上加难。对这些遗族来说,他们面对的历史挑战几如泰山压顶,令人唏嘘啊!

正如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授予蓝博洲《寻找祖国三千里》的颁奖辞所说:“这些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个人史,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也重新见证了文学的光辉!”



正如周作人散文追求取材阔大,“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纳入笔端。“袖珍小说”与“盆栽小品”的文体追求反映了作家对作品肌理结构的探索,也隐喻作者“初老”岁月的人生心境与修持。关于创作风格上的变化,刘大任坦言:“以前写小说,鲁迅是我精神上的私淑对象之一。现在写散文,还是跟周家脱不了关系,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成了我另一个私淑对象。”读刘大任的作品,无论是早年潜藏现代主义影响的文字,还是近年谈园林、谈运动的文章,总能在笔墨纸端遭遇那些作家与前行者视线相交的瞬间。刘大任与鲁迅、周作人之间的汇合点,正是延续在两代人精神世界中的五四传统。刘大任及其背后的保钧一代,人生过程中面临的思想境遇,与前行的周氏兄弟存在何其相似的困境。谈到台湾战后文学,刘大任更直言:“我至今仍觉得,台湾战后走了张爱玲那一条路,而舍弃了鲁迅,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刘大任是上世纪70年代保钧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随父母赴台,1956年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1958年再转入哲学系就读,1960年,正在读大三的刘大任在《笔汇》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逃亡》。1965年,他从夏威夷大学回到台湾,与邱刚健、陈映真、王祯和等人合办《剧场》杂志;翌年,则和尉天骢合办《文学季刊》。保钧运动的突如其来,使成长于国民党民族主义教育下、被隔离于现实社会和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代知识青年,得以睁开眼睛,打开心灵,对所处的社会与历史做重新探索 and 发现。保钧运动最初虽以爱国为诉求,但很快就超越了爱国运动的局限,开启了第三世界的觉醒,以世界视野来重新自我认识。

保钧运动落潮后,荷载独彷徨的刘大任感悟到“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间,有一个暧昧领域”。激进与狂飙的文化浪潮对文化生态的合理运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如何穿越这个“暧昧领域”,作家的选择是直面属于中国历史空文化脉络的参照体系。这个参照系,不仅隐隐地影响着他在园

林中选择植物的眼光、搭配风景的企图,而且支配着刘大任在保钧落潮之后回归文学路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如果熟悉刘大任早年写作的《杜鹃啼血》与《浮游群落》,不难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台湾知识青年为了逃脱或严体制下的社会压抑与思想禁锢,是如何在文化寻求出路的转型时代以曲折方式默默求索。刘大任这一代创作者特殊的知识结构与战后台湾社会特殊的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一方面,国民党“反共”民族主义教育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一代的生命成长经验,这就是刘大任所说的“国耻教育”。但是民族主义教育对知识青年启蒙思想的催化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一方面,美式现代化思潮伴随战后美援体制经由官方与民间各个渠道渗透台湾知识界,但同时这场台湾的“文艺复兴”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左翼思想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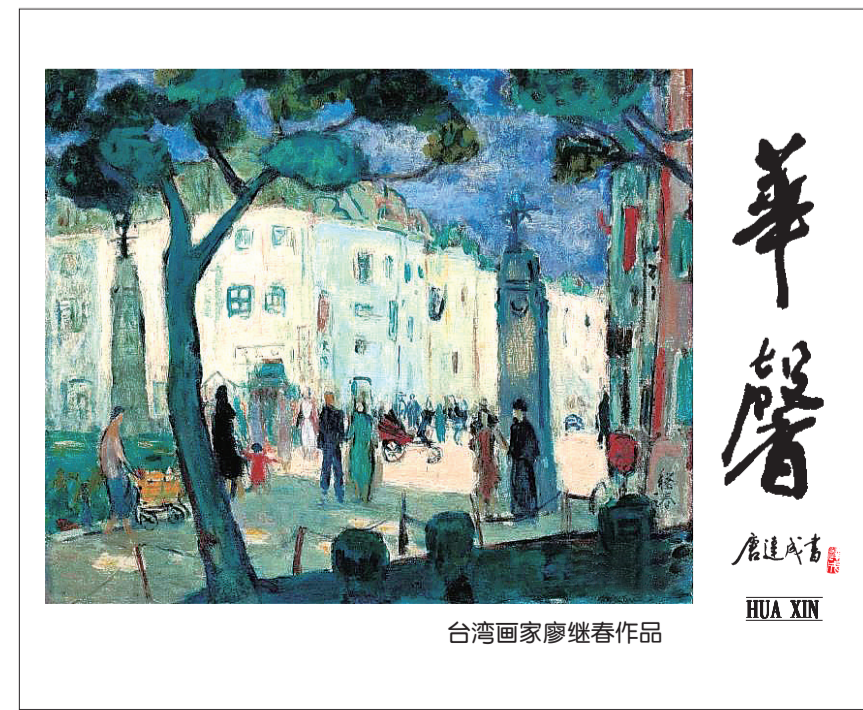
由是观之,《枯山水》与《当下四重奏》中隐然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忧患与使命感,更有曾经亲身参与保钧运动的理想与坚守,犹如“悬崖边的树”在各种文化风潮中傲然挺立。《当下四重奏》虽然以家庭生活为中心进行铺展,但毫无琐碎与乏味,在异国他乡借由文字和思想寻根问祖,有两代人之间文化差异的无奈、安逸生活中壮志日渐消磨的焦虑、所托所寄中可以窥见晚年的孤寂与不安。在刘大任的文字中,“园林”是不可忽略的空间变化,“无果园”阶段,虽然花花草草繁盛,却有花无果,总有些自我放逐的意味。随着孙辈接二连三前来报到,人生从中年迈向“初老”。离开经营30多年的“无果园”,从零开始打造有花有果的“囿园”。造园布局的选择与变化已然对应了主人在不同时节、不同人生阶段心境的收与放。

《枯山水》中,刘大任利用自身丰富的博物学经验,有意以不同植物的习性隐喻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索。以喜林芋绝处逢生的生长经验,暗示老芋仔精打细算、挣扎求生的生活轨迹;以贴梗海棠一株二花的特性暗喻台湾画家

在岛内外艺术市场被“标签化”的“双重身份”;利用羊齿植物在生态演化过程中的“先锋角色”说明自然界生态进化与人类社会文化演化的异曲同工。通过与土地、自然深层接触的园艺活动表达作家对自然和人类关系的理解,刘大任回望自己曾奉献青春的保钧历程,探问中国文明起源,试图在“两周之间”寻一条“铺垫之路”。

无论现实生活的选择还是书斋中的探寻,刘大任的创作根基还是立足于历史脉络中的人间情怀。现实生活中与外部世界的缠斗和妥协,理性维度面对精神世界的沉思与探问,往往出自同一个逻辑原点——知识分子的自我更新。《当下四重奏》中作家化身退休的中国史教授,身居异国却心系故土,以貌似神离的婚姻关系、暗礁四伏的亲子关系隐藏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历史重负与文化冲突。虽然心怀亲戚团聚一堂的“简家寨”梦想,但现实中“儿子”的谋生手段却离不开台湾廉价电子产品,暗示

了台湾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依附性。以儿子作为第一人叙述的《乐园》中,迪士尼游乐园是一个具有多重隐喻的空间,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儿媳心目中,迪士尼是近40年的人生中比孩子出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幸福记忆;在儿子看来,祖孙三代出游迪士尼是家族乌托邦梦想的初步测试;在父亲看来,这却是充满了“好莱坞、商业主义、白人中心、弄虚作假……”的消费主义思想。就如同《当下四重奏》捕捉日常生活的矛盾,却并不局限于“当下”这一现实,而是从不同侧面聚焦中华民族因两岸长期分离所造成的隐藏于每一个个体中的精神内伤,进而探寻如何疗愈的巨大难题。刘大任的不凡之处还在于能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体会自由的思绪,不为所累、不畏其苦,能在自然的怀抱中酿出知识分子独有的苦乐,这是书斋里的文人不具有的。断裂的历史该如何接续,在这个问题上,刘大任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台湾画家廖继春作品